

何典

张南庄 著



I 242.4
95

9014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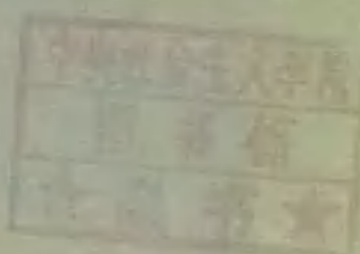
张南庄 著

何典



200190532

天津古籍出版社



[津]新登字 007 号

何 典

[清]张南庄

*

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

天津石化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7 字数 135 千字

1994 年 1 月第 1 版 199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-8000

ISBN7- 80504-324-8

I·53 定价:5.80 元

天津古籍社版《何典》题记

《何典》，一名《第十一才子书》，又名《鬼话连篇录》，或合称《第十一才子书鬼话连篇录》。原名当为《何典》，这不仅有鲁迅先生“偶然在光绪五年（1879）印的《申报馆书目续集》上看见”的“《何典》题要”为证，更有作者原序和海上餐霞客所作跋语为证。至于何以又有后三种名目，据刘半农先生《关于〈何典〉的再版》说，是“上海翻印小说的人，往往改换名目”所致。

《何典》原题“过路人编定”。“过路人”何许人也？乃清代乾嘉时上海才子张南庄。其人其事，可见本书所附海上餐霞客跋语，此不赘。

《何典》有评，评者原题“缠夹二先生”，其真实姓名为陈得仁。据刘半农先生在1926年所

买到的那部“不完全的石印”本，陈得仁乃茂苑（即江苏旧长洲县，今属苏州市），而其具体身世则迄今不详。

我知道天地间有《何典》这么一部“奇书”，是四十多年以前的事了。当时我读初中，寒假期间翻检父亲火余存书时看到了它，以其篇幅不巨，又有插图，便随手翻阅起来，而且越看越爱看，不料看得正有趣的时候，被从田间归来的父亲发现了。父亲慈祥而又严肃地说：“老不看谋略书，少不看鬼蜮书。《何典》是写鬼蜮的，你还是不看为好。”对父亲的教诲，我向来是不敢违拗的，只好把它放回原处。后来读大学时我又想起了《何典》，可怎么找也找不到了，问父亲，说是“早把它祭灶了”。我不无埋怨地说：“当年日本人烧咱们的书，一提起来，您总是恨恨不已，现在您自己倒烧起来。”父亲解释说：“日本人烧咱抢咱，那是侵略者的恶行，当然要恨。我烧《何典》，烧《八宗剑侠》什么的，不是怕少儿不宜吗。早知你读中文系，找就不烧了，还会护若头目哩。”“文革”期间，我在天津为民制药厂当库工，“手舞足蹈滚铁桶，扬眉吐气耍木箱”——“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”时，

通过同厂友人从古旧书店买到了《何典》，我躲在我分管的包装材料库里，一口气读完了它。

无论什么版本的教科书，都没提及《何典》这部篇幅不大的章回体滑稽小说，但我一直很喜欢它。这倒不仅仅因为它可读性很强，“谈鬼物正像人间，用新典一如古典”（鲁迅为刘半农校点本《何典》所写《题记》语），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；也不仅仅因为它在自古以来即已有之的“鬼文化”——“鬼文学”——“鬼小说”中应占一席不容小觑的地位；而且，还因为它是一座虽然不大却很有研用价值的语言资料库。我是学语言的，尤其看重它这一价值。

由于天津古籍社版《何典》依次收录有刘半农《关于〈何典〉的再版》、鲁迅《题记》和《为半农题记〈何典〉后，作》、林守庄为刘半农校点本所写的序、刘半农《重印〈何典〉序》、太平客人的《何典》原序、作者张南庄的自序以及海上餐霞客原跋，所以关于《何典》一书的许多情况，这里就不再一一介绍了。需要顺便指出的是，1932年日本编纂《世界幽

默全集》时，鲁迅应“负责中国部分”的增田涉之请，曾把《何典》介绍并寄给日本出版者，称它“近来当作滑稽本，颇有名声”（1932年5月22日《致增田涉》所附《何典》介绍语）。还不能不另赘一语的是，《何典》虽然“在死的鬼画符和鬼打墙中，展示了活的人间相，或者也可以说是将活的人间相都看作了死的鬼画符和鬼打墙”（鲁迅《题记》），对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某些社会现实进行了辛辣的讽刺，“有其民主性精华，但也有其封建性糟粕；从写法和技巧上看，《何典》虽然有新异性，但正如鲁迅所批评的那样，也有失于“甚浅薄”的地方，特别是那种“‘江南名士’式的滑稽”（同上）。

天津古籍社版《何典》的底本是1933年北新书局版，但在版式处理上有所变动：一是增加了眉题；二是把刘半农的校注语随行置于相应的字词语之后的圆括号内，而原来加在所校注的字词语旁的◎号则一并省去；三是刘半农对书中所用俚语均以○号标示之，此本则亦省之；四是省去原版重复出现在卷次后回次前的“缠夹失生评”和“过路人编定”二语；五是直接语言即“人物”对

话分行排，以醒读者眼目。另外，还请当今的书装艺术家重新设计了封面，每回有一新绘插图，以飨读者。

金谷斋斋主 钟 南

癸酉岁秋九月于海河之滨

关于《何典》的再版

关于《何典》的再版，有几句话应当说明：

（一）这回增刻的，有鲁迅的一篇《为半农题记〈何典〉后，作》，有林守庄先生的一篇序。

（二）“空格令人气闷”这一句话，现在已成过去。

（三）我容纳了许多读者的指示，在注释上及句读上，都有相当的改正；我就顺便在此地对于赐教诸君表示极恳挚的谢意。

（四）半月前，我又在冷滩上买到了一部不完全的石印小书，其内容即是《何典》的下半部，但封面上写的是《绘图第十一才子书》，书中的标目，却又是《鬼话连篇录》。这都没有关系，因为上海翻印小书的人，往往改换名目。可是原书中的“缠夹二先生评，过路人编定”，在这翻印本里已改做了“上海张南庄先生编，茂苑陈得仁

小舫评”。从这上面，我们不但可以决定张南庄是上海人面不是上虞人（因为有许多人这样怀疑），而且连缠夹二先生的真姓名也知道了。不过这张、陈两先生的身世，现在还无从考查。从前，我在《语丝》上登了个启事，希望能有人替我在上海张氏家谱上查一查，现在我再在此处重申前请，希望爱读《何典》面能见到上海张氏家谱的人，不吝赐教。

刘 复

一九二六，十二，十一

题 记

《何典》的出世，至少也该有四十七年了，有光绪五年的申报馆书目续集可证。我知道那名目，却只在前两三年，向来也曾访求，但到底得不到。现在半农加以校点，先示我印成的样本，这实在使我很喜欢。只是必须写一点序，却正如阿Q之画圆圆，我的手不免有些发抖。我是最不擅长于此道的，虽然老朋友的事，也还是不会捧场，写出洋洋大文，俾于书，于店，于人，有什么涓埃之助。

我看了洋本，以为校勘有时稍迂，空格令人气闷，半农的士大夫气似乎还太多。至于书呢？那是：谈鬼物正像人间，用新典一如古典。三家村的达人穿了赤膊大衫向大成至圣先师拱手，甚而至于翻筋斗，吓得“子曰”店的老板昏厥过去；但到站直之后，究竟都还是长衫朋友。不过

这一个筋斗，在那时，敢于翻的人的魄力，可总要算是极大的了。

成语和死古典又不同，多是现世相的神髓，随手拈掇，自然使文字分外精神；又即从成语中，另外抽出思绪：既然从世相的种子出，开的也一定是世相的花。于是作者便在死的鬼画符和鬼打墙中，展示了活的人间相，或者也可以说是将活的人间相，都看作了死的鬼画符和鬼打墙。使是信口开河的地方，也常能令人仿佛有会于心，禁不住不很为难的苦笑。

够了。并非博士般脚色，何敢开头？难违旧友的面情，又该动手。应酬不免，圆滑有方；只作短文，庶无大过云尔。

中华民国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，鲁迅谨撰

为半农题记“何典”后，作

还是两三年前，偶然在光绪五年（1879）印的申报馆书目续集上看见《何典》题要，这样说：

《何典》十回，是书为过路人编定，铤夫二先生评，而太平客人为之序。书中引用诸人，有曰活鬼者，有曰穷鬼者，有曰活死人者，有曰臭花娘者，有曰畔房小姐者：阅之已堪喷饭。况阅其所记，无一非三家村俗语；无中生有，忙里偷闲。其言，则鬼话也；其人，则鬼名也；其事，则开鬼心，扮鬼脸，钓鬼火，做鬼戏，搭鬼棚也。语曰，“出于何典”？而今而后，有人以俗语为文者，曰“出于《何典》”而已矣。

疑其颇别致，于是留心访求，但不得：常维钧多识旧书肆中人，因托他搜寻，仍不得。今年

半农告我已在厂甸庙市中无意得之，且将校点付印；听了甚喜。此后半农便将校样陆续寄来，并且说希望我做一篇短序，他知道我至多也只能做短序的，然而我还很踌躇，我总觉得没有这种本领。我以为许多事是做的人必须有这一门特长的，这才做得好。譬如，标点只能让汪原放，做序只能推胡适之，出版只能由亚东图书馆；刘半农，李小蜂，我，皆非其选也。然而我却决定要写几句。为什么呢？只因为我终于决定要写几句了。

还未开手，而躬逢战争，在炮声和流言当中，很不宁帖，没有执笔的心思。夹着是得知又有文士之徒在什么报上骂半农了，说《何典》广告怎样不高尚，不料大学教授而竟堕落至于斯。这颇使我凄然，因为由此记起了别的事，而且也以为“不料大学教授而竟堕落至于斯”。从此一见《何典》，便感到苦痛，再也说不出一句话。

是的，大学教授要堕落下去，无论高的或矮的，白的或黑的，或灰的。不过有些是别人谓之堕落，而我谓之困苦。我所谓困苦之一端，便是失了身分。我曾经做过《论“他妈的！”》，早有青年道德家乌烟瘴气地浩叹过了，还讲身分么？

但是也还有些讲身分。我虽然“深恶而痛绝之”于那些戴着面具的绅士，却究竟不是“学匪”世家；见了所谓“正人君子”固然决定摇头，但和歪人奴于相处，恐怕也未必融洽。用了无差别的眼光看，大学教授做一个滑稽的，或者甚面至于夸张的广告何足为奇？就是做一个满嘴“他妈的”的广告也何足为奇？然而呀，这里用得着然而了，我是究竟生在十九世纪的，又做过几年官，和所谓“孤桐先生”同部，官——上等人——气骤不易退，所以有时也觉得教授最相宜的也还是上讲台。又要然而了，然而必须有够活的薪水，兼差倒可以。这主张在教育界大概现在已经有一致赞成之望，去年在什么公理会上一致攻击兼差的公理维持家，今年也颇有一声不响地去兼差的了，不过“大报”上决不会登出来，自己自然更未必做广告。

半农到德法研究了音韵好几年，我虽然不懂他所做的法文书，只知道里面很夹些中国字和高高低低的曲线，但总而言之，书籍具在，势必有人懂得。所以他的正业，我以为也还是将这些曲线教给学生们的。可是北京大学快要关门大吉了；他兼差又没有。那么，即使我是怎样的十

足上等人，也不能反对他印卖书。既要印卖，自然想多销，既想多销，自然要做广告，既做广告，自然要说好。难道有自己印了书，却发广告说这书很无聊，请列位不必看的么？说我的杂感无一读之价值的广告，那是西滢（即陈源）做的。——顺便在此给自己登一个广告罢：陈源何以给我登这样的反广告的呢，只要一看我的《华盖集》就明白。主顾诸公，看呀！快看呀！每本大洋六角，北新书局发行。

想起来已经有二十多年了，以革命为事的陶焕卿，穷得不堪，在上海自称会稽先生，教人催眠术以糊口。有一天他问我，可有什么药能使人一嗅便睡去的呢？我明知道他怕施术不验，求助于药物了。其实呢，在大众中试验催眠，本来是不容易成功的。我又不知道他所寻求的妙药，爱莫能助。两三月后，报章上就有投书（也许是广告）出现，说会稽先生不懂催眠术，以此欺人。清政府却比这干鸟人灵敏得多，所以通缉他的时候，有一联对句道：“著中国权力史，学日本催眠术。”

《何典》快要出版了，短序也已经迫近交卷的时候，夜雨潇潇地下看，提起笔，忽而又想到

用麻绳做腰带的困苦的陶焕卿，还夹杂些和《何典》不相干的思想。但序文已经迫近了交卷的时候，只得写出来；而且还要印上去。我并非将半农比附“乱党”，——现在的中华民国虽由革命造成，但许多中华民国国民，都仍以那时的革命者为乱党，是明明白白的，——不过说，在此时，使我回忆从前，念及几个朋友，并感到自己的依然无力而已。

但短序总算已经写成，虽然不像东西，却究竟结束了一件事。我还将此时的别的心情写下，并且发表出去，也作为《何典》的广告。

鲁 迅

五月二十五日之夜，碰着东壁下，书。